



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刊发陈平原、宋浩两篇文章,一篇讨论城市记忆,一篇考索清代尺牍。

今年恰逢广州建城2240年、得名1800年,陈平原先生藉此回看十余年间七篇与广州有关的讲演文字。他从“记忆”既可作名词、亦可作动词说起,区分被动的“广州记忆”与主动的“记忆广州”。所谓“记忆广州”,并非对既有印象的简单追怀,而是让个人经验

进入比较、辨析与裁断,由此形成对一座城市的主动认识。中大康乐园、北京路新/旧书店等个人记忆,也由此推展至城市比较、文物活化、岭南文化以及人文学者对现实的介入。“记忆广州”,在这里既是文章的题目,也是一种从经验出发、经由理性辨析而进入城市问题的认识方法;文章最终又落到人文学者能否提出“真问题”的追问上。

宋浩先生则从一通未署年份的

袁枚书札入手,由“为家慈九秩介觞”“三年之期已过”等字句寻绎线索,以赵怀玉、袁枚诗作、洪亮吉书信及相关文献相互参证,将此札系于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十二月二十日。祝寿、求序、三年等待与最终交稿由此各归其位;一篇未收入袁枚文集的佚序、部分版本《小仓山房尺牍》漏印的《答赵味辛》,也随之进入视野。启功应钟敬文之请所题的两

首绝句,则为这通清代书札补上了近现代的收藏与题咏史。

一篇从经验出发,辨析城市、追问现实;一篇从尺牍入手,钩稽细节、还原故实。

一城一札,一阔一微。所论虽异,学问的分量,终究落在问题是否真切、材料是否扎实。法各有其径,文各见其深。

策划:温建敏 执行:潘玮倩

我之“记忆广州”

□ 陈平原

荐的是第五节“见了领导千万别激动”。此文初刊《中华读书报》2012年2月8日,最后那句深深的感叹,当初曾收获不少掌声:“作为学者,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、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;至于领导在不在场,民众爱不爱听,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,不在考虑之列。”

(二)《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》,此乃我2012年8月18日在吉隆坡为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演讲,以及11月10日在中山大学的专题讲座。

其中第一节“城市为谁而建”,我强调城市应该是为广大市民,而不是为官员或观光客而建,因此,小巷深处,平常人家,才是城市的精髓所在。“相对来说,我更喜欢广州、台北,而不太喜欢北京、上海。作为城市,后两者被高估,前两者被低估。现在的北京、上海都很繁华,市容比台北、广州漂亮,有气派。但总觉得有点夸饰,不如台北或广州实在。”如此比较与抑扬,是因我在讲座中谈及自己对这六大城市的历史想象与直接观感——曾经是帝都故历史底蕴深厚的北京与西安,较多接受西方商业及思想文化影响的香港和上海,兼及古今中外城乡雅俗、比较适合日常居住的广州和台北。

(三)《城市史、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——如何在城市建设中保护历史文化命脉》,这是我2013年8月19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干部大学堂的演讲,没有正式成文,谈得比较开。

其中有这么一段:昨天看了十香园纪念馆,我很感动。那座清代岭南园林,是居巢、居廉故居,也可以说是岭南画派发祥地。此前我做过高剑父、陈树人、高奇峰等人的研究,着眼点主要是《时事画报》《真相画报》,不太牵涉此前他们的学画过程。这个十香园,就好像在定位明确,是“活的文物”。遗址保护很容易做

成僵硬的博物馆,如何“活化”其机能,保持其生命力,是个难题。成就此等好事,必须“天时地利人和”;太早太晚都不做好,除了心志,关键在把握好时机。

(四)《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》,这是我2018年5月15日在香港城市大学、6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、6月23日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主办的“青睞讲堂”的演讲,整理成文,初刊《北京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10期。

其中谈及广州的历史以及风景的变迁,特别提到镇海楼(明洪武十三年,永嘉侯朱亮祖扩建广州城,把城墙扩展到越秀山上,并在山顶建楼五层,俗称五层楼)、西关骑楼(新加坡—香港—广州,张之洞、陈炯明主导,20世纪初陆续建成)、五羊雕塑(1956年,时任广州市市长朱光指示,要创作一个能代表广州市形象的标志性雕塑,就像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一样,成为一座城市的城标;1960年建成)、白天鹅宾馆(由霍英东先生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投资合作兴建而成,1983年开业,位于珠江白鹅潭畔,坐拥520间豪华客房与套房,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)、小蛮腰(广州塔,总高度600米,2009年建成,2010年正式对外开放)。最能显示我的个人阅历及心境的,当属特别提及作为改革开放象征的白天鹅宾馆。

(五)《“风俗”如何“图谱”——关于青木正儿与〈北京风俗图谱〉》,此乃我2020年8月15日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稿,此前此后也有类似发言或讲座,但以上海这次准备最为用心,讲稿刊《北京社会科学》2020年第4期。

演讲中我提及黄时鉴、沙进编著的《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——三百六十行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),该书汇

集美国皮博迪·埃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460幅中国外销画,其中18世纪细呱所绘100幅水粉画与19世纪30年代庭呱所绘360幅黑色线描画,描绘的都是广州的市井行当,且不少构图互相因袭。另外,还推荐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《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》。

(六)《岭南文化的新变与大湾区的未来》,这是我2021年9月17日在广州楠枫书院与黄天骢先生对话的题目,《南方都市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周刊》及“中国新闻网”等有长短不一的报道;12月8日深圳南山区委宣传部在前檐书店举行“小说史学与文学教育——陈平原教授著作风采展”,因新冠疫情没能到现场演讲,播出提前制作的话题演讲视频。

在演讲视频中,我引述了多年前的问答《岭南文化如何“步步高”》(《广州日报》2013年4月16日):“你问‘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’,我相信十个人有十种说法,且都有道理。我自己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——如注重实用,少讲排场,理性低调,灵活机动,不欣赏吊死在一棵树上,也不追求‘不到黄河心不死’。另外,因广州在大一统时代从来不曾做过帝都,对日常生活、经济运作、文化创造起决定性影响的,往往是民间的立场、民间的力量、民间的趣味。”另外,我提及2010年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“岭南文化十大名片”评选,特别为“广交会”人选叫好,这隐含我的基本立场:谈城市,最好能兼及古今。”学者谈论地域文化时,大都喜欢从远古说起。可在我看来,相对于古代的基因,近代以降的历史进程更值得重视。任何有生命力的‘传统’,都具有自我修正、自我更新的能力。就像一条河流,有时潜入溶洞,不见

踪影,有时又冲出地面,湍急澎湃,你必须登高望远,才能看清其大致走向。”

(七)《如何让城市更有文化?——都市研究的方法、魅力及可能性》,那是我2025年3月15日在广州“岭南大讲堂”的专题演讲,相关报道不少,最精彩的当属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3月23日的《陈平原:在时代大潮中,如何守住城市文化的“根”?》。

演讲中,我介绍了2024年自己在“北上广深”各做了一场关于都市文化研究的发言或讲座,题目各不相同,但在两处谈及“关于城市,人文学者能做什么”,我说了以下三句大白话:第一,城市问题的复杂性,超越一般人的想象。具体操作中,有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。人文学者不能只是矜才使气——可以持批判立场,但必须理解你的批判对象的立场及思路。第二,城市学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。假如你不仅仅是埋怨,而希望有所作为,必须参与进去,介入日常事务。第三,“城市研究”需要跨学科的视野,而且兼及学术与实践,才能有比较宏阔的视野,通达的见解。了解不同学科的长处与局限性,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。

明明不是“广州学”专家,为何不自量力,跑来这里班门弄斧?那是因我认定,进入AI时代,学科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,发言成功与否,主要不取决于是否内行或学问大小,而在能否提出“真问题”。若上述关于广州的追忆与评述,有哪句话能让读者触发有趣联想,引起强烈共鸣,那就算圆满完成工作了。

2026年8月1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(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、博雅讲席教授、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,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)

启功题《袁枚致赵怀玉书》

□ 宋浩

随园先生袁枚老夫子以一部《小仓山房尺牍》畅销文坛数百年,但真正流传下来的袁枚尺牍真迹却如凤毛麟角。钟敬文先生旧藏《袁枚致赵怀玉书》一通三开,其中提到的人与事甚至时间,皆有记载,极其难得。启功先生为之题诗二首:

词锋无碍义无挠,笔底天风挟海涛。试向雍乾寻作手,随园毕竟是文豪。望溪八股阮亭诗,格熟功深号祖师。我爱随园心别透,天真烂漫嚇人时。一九七六年春。静闻先生命题,即乞削正。启功。 铃印:启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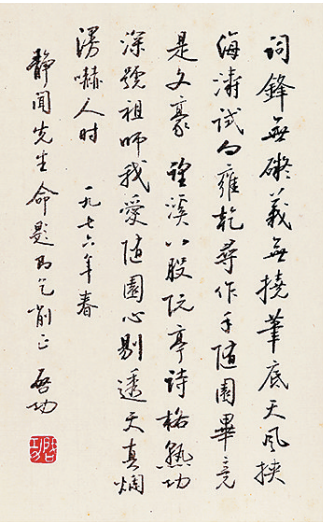
钟老的一个斋号是天风海涛室,启老在题诗的第二句嵌入其中,说明了二老的友谊。其实第二首的第二句“格熟功深号祖师”也是隐喻钟老是中国民俗学的祖师,有着双重的意思。1989年,启老将这两首诗收入了《启功韵语》的《论诗绝句二十五首》中。袁枚书札的全文如下:

昨蒙赐顾,并为家慈九秩介觞,古谊稠叠,而枚不敢接谈握手,归殊惘惘。今早理宜趋谢,缘家事纷如,群宾麻集。受君子之隆仪,缺登门之泥首,何愧如之。所命序《乐府》一事,不特驺体难为,即散文亦不敢轻于落墨。俗事毕,然后再治雅事。三年之期已过,一行之墨未佳,非知我之人何能谅我耶。要知尊作二本至今焚香呵护,勿以遗失为虞也。枚心所拳拳,刻不敢忘足下者。古文散体一门,时贤绝少。惟我老友嘯山与足下文情古茂,曲折如意,真乃欧曾高手,望时时多作之。篇成即以寄我。而枚文鐫毕先当寄求教削。千秋事业,彼此相期。诸惟珍重不宣。 映川世长兄足下。 袁枚顿首。十二月二十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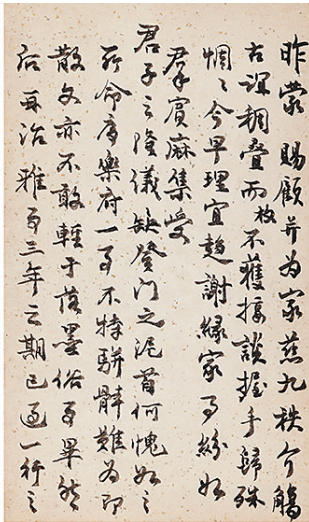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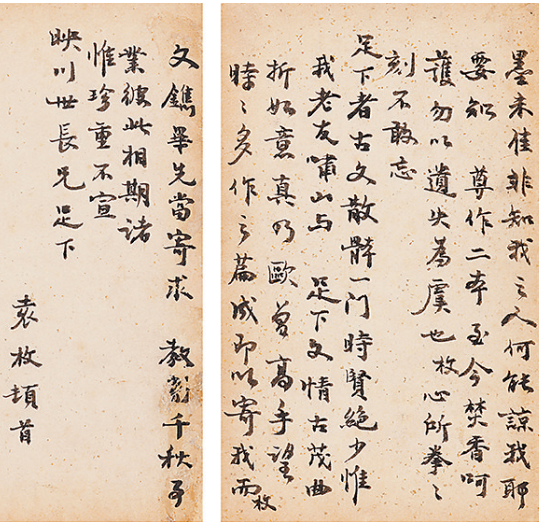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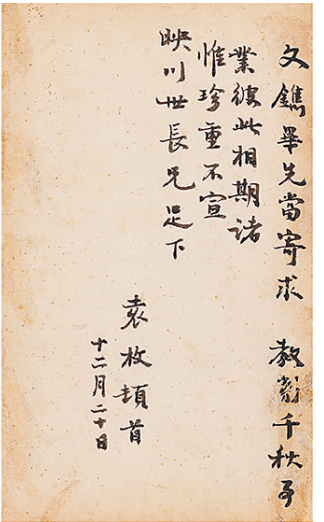
此札的上款人映川,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七·二一有提到:“今日文人,常州为盛。赵怀玉字映川,能八家之文。”这

个赵怀玉是最近研究的热门人物,刚刚整理出版的煌煌四巨册《赵怀玉集》,为我们考证这通信札提供了方便。此前他的集子颇不易见到。赵怀玉,字映川,又字亿生,号味辛,晚号收庵。集子的整理者说他:于“毗陵诗派”而言,怀玉为中坚;于“阳湖文派”而言,怀玉是先导,是乾嘉常州文坛的中坚力量。此说并不为过。同时他出身世家,交游广阔。他的曾祖赵熊诏,是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己丑科状元。史学家赵翼是他的同族祖父辈,在《瓠北集》卷四十三有《送味辛族孙赴青州司马任》,还请他撰写自己的年谱。洪亮吉是他的表兄,洪的《卷施阁集》中有《送赵表弟怀玉南归即呈侍御舅氏兼寄孙大》一首。他还和洪亮吉、孙星衍、黄景仁、杨伦、吕星垣、徐书受等被称为“毗陵七子”。翁方纲、法式善、王昶、王文治与他也多有唱和。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参与《四库全书》修撰时,将《简明书目》录副,与好友金德舆、鲍廷博精心校对,在杭州刊刻,乃嘉惠学林的至善之举。

袁枚是赵怀玉的长辈,所以在此札中称他为“世长兄”。对他也多有赞赏和提携,除了前引诗话,此札中亦赞他古文“真乃欧曾高手”,把他与欧阳修、曾巩相比。此外,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二·四九也提到赵怀玉:“余六十三岁,方生阿迟。时家弟春圃观察在苏州,勾当公事;接江宁方伯陶公飞檄文书,意颇惊骇,拆之,但有红笺十字云:‘令兄随园先生已得子矣。’常州赵映川舍人诗云:‘佳闻有人驰驿报,贺诗经月把杯听。’”这首诗收在赵怀玉《亦有生斋集·诗》卷第六,题为《和袁丈(枚)六十三生子诗(小字阿迟)》,全诗为两首,此句在第二首。第一首中有句“先生若到高堂寿,又见孙桐擢秀时。”赵怀玉小注:“太夫人春秋九十有四。”这首诗在赵集的系年是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。这与袁枚的年谱是相合的,在这一年的二月九日,袁枚的母亲章氏去世。七月二十三日,钟姬为袁枚生一子,名“阿迟”。



钟敬文旧藏《袁枚致赵怀玉书》及启功题诗



图片由钟敬文之子钟少华提供

据此,此札所言“为家慈九秩介觞”,即袁枚母亲的九十寿宴,当在四年前,则此札当作于乾隆三十九年甲午(1774年),袁枚年五十九,赵怀玉年二十八。

在第二年乾隆四十年乙未(1775年),袁枚有《六十》诗四首,第一首有“尽凭朝士呼前辈,尚有慈亲唤小名。”之句,第二首有句“年来剩有骄人处,九十萱堂万卷书。”讲的都是袁母高寿九十的盛况。第三首:“三月初三柳正飘”,则是作诗的具体时间。从中也可印证袁母的寿宴必在此诗写作之前,此札落款“十二月二十日”,则为前一年即乾隆三十九年甲午(1774年)的十二月二十日。

关于这次到随园赴宴的情况,赵怀玉《亦有生斋集·诗》卷第五有《寄袁丈(枚)》长诗一首,亦有记述。此诗系年萌蒙协治(乙未),与袁枚的《六十》在同一年。诗中有云:“忆昨曾投刺,相延为展屏。秋瞻南极现,花向北堂馨。法曲回飞雪,华灯灿列星。(客秋过随园,为张华缙之会。)杯倾千日醕,饌设五侯饕。”头两句,所记也是此札中所言之事,即“所命序《乐府》一事,……三年之期已过,一行之

墨未佳,非知我之人何能谅我耶。要知尊作二本至今焚香呵护,勿以遗失为虞也。”也就是说在甲午(1774年)袁母寿宴的三年前,即乾隆三十六年辛卯(1771年),赵怀玉曾投书袁枚,请袁枚为他编撰的《乐府》写序。但三年已过,袁枚仍未落墨。巧的是,赵怀玉这封求序的信,被袁枚收在《续同人集》里,信中说:“《乐府》纸缮甚多,呈请评鹭,或赐一序,得徐、庾之文藉以不朽,幸甚!”

袁枚的序后来还是写了,并连同《乐府》的稿子一起托洪亮吉转交赵怀玉。洪亮吉《卷施阁文甲集》《与袁简斋书》云:“昨奉手书,寄到赵君乐府,并为作序,冠其简端,具见阁下奖掖后进,勤勤无已之心,为赵君称感者再,反复数四。”今本《赵怀玉集》可以看到袁枚这个序,序中说:“味辛诗如箴如铭,微而婉,隐而显,言近而意远,飒飒乎六艺之道萃焉。”末署“乾隆乙未秋钱塘袁枚”,与赵怀玉的《寄袁丈(枚)》长诗写于同一年。这篇序没有收进袁枚的文集,是篇佚文。

此外,袁枚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七·一七三有《答赵味辛》一札。有些版本



的《尺牍》漏印了五篇书信,这通《答赵味辛》正好是漏印之一。在函中袁枚说赵怀玉:“近今海内才人,仆曾识大半,要如足下之有坚实本领,无丝毫客气者,目中却少概见。……来札云‘人生贵适意,修短有数,岂区人力所能挽回。明知高谈伤气,而兴之所到,有所不恤’,与老人见解相符,可谓一点灵犀,心心相印矣。”

(作者系前媒体人、出版人、策展人。曾创办《收藏·拍卖》《时代周报》等杂志、报纸,参与主编《二十世纪书法经典》丛书,主编《学人墨迹》丛书等。策展“董桥写字”“听雨文迹——高伯雨书画展”“水云留痕——陈君葆和他的朋友们”等展览。)